

蒋福亚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魏晋南北朝

经济史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地位述论

东晋南朝的土地所有制

魏晋南北朝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政府的依附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



JFY
4
K2

蒋福亚
著

魏 晋 南 北 朝

经 济 史 探

甘肃人民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探 /蒋福亚著.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226-02910-3

I. 魏... II. 蒋... III. 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时代-研究 IV. K23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0406 号

责任编辑:李树军

封面设计:宋武征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探

蒋福亚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70 千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6-02910-3 定价:48.00 元

目 录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地位述论·····	(1)
三吴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江南河的开凿·····	(18)
魏晋南北朝北方的农业耕作方式·····	(40)
魏晋之际河西走廊经济主体的演变·····	(52)
魏晋南北朝河北经济的发展·····	(62)
由户口变动看蜀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地主经济·····	(76)
吴国的地主经济·····	(92)
东晋南朝的大土地所有制·····	(115)
东晋南朝的占山护泽·····	(125)
南朝寺院地主·····	(148)
均田制实施期间丁男年限不断缩小的原因·····	(160)
略谈汉唐间的租佃关系·····	(187)
魏晋南北朝的租佃关系·····	(207)
魏晋南北朝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	(224)
有关《嘉禾吏民田家莛》性质的补充意见·····	(239)
也谈《嘉禾吏民田家莛》中“二年常限”田的涵义·····	(245)
《嘉禾吏民田家莛》中的“余力田”·····	(255)
略谈吴国国有土地租佃关系制度化的原因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莛》研讨·····	(269)
魏晋之际依附民的合法化·····	(285)
“客皆注家籍”溯源·····	(297)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政府的依附民·····	(305)
《嘉禾吏民田家荊》中的诸吏·····	(346)
南朝三吴地区的十夫客·····	(357)
略论魏晋南北朝的奴婢·····	(365)
魏晋之际关中经济的恢复和氏族内迁的关系·····	(381)
论鲜卑慕容部的封建化·····	(398)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	(415)
“闭门为市”释·····	(437)
论南齐永明年间的和市 ——兼论三吴在宋齐之交已成为我国封建时代新生的 经济重心·····	(446)
《齐民要术》所见农民和市场的关系·····	(461)
卷尾语——往事追忆·····	(475)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地位述论

魏晋南北朝始于魏文帝曹丕代汉的黄初元年(220年),终于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的开皇九年(589年),叙史时则往往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之乱开始,恰为四个世纪。其中除西晋短期统一外,全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这一时期,皇朝更迭频繁,割据政权林立,战乱频仍,经济文化受到严重的摧残。更鉴于它介乎秦汉和隋唐之间,这两个时期,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第一次和第二次经济文化高涨的时期,在世界上有深远的影响。因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地位往往不那么引人注目。其实,这一时期具备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两大经济文化高潮间的过渡时期,是第二次经济文化高潮的准备时期,无论在经济、民族关系及政治等诸方面,都呈现出这一风貌。没有魏晋南北朝的准备,决不能出现隋唐时期繁荣昌盛的局面。本文拟就此略呈刍议。

—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前期经济文化的高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两汉,影响所至,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这种差异,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与唐前期的经济制度,诸如均田制度、户籍制度、赋役制度、和籴及回造纳布之类的措施有关,更与他们凭借的经济区域的大小和封建社会内部阶级关系的演变有关。隋唐前期的经济制度源自南北朝,这是人所共知的,这里着重谈一

下经济区域和阶级关系局部演变的问题。

秦汉帝国是强大的,但它凭借的经济区域却比较狭小,主要是关东、关中、益州,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则十分落后。直到东汉后期,这里绝大部分地区依然处在火耕水耨的阶段。陇右河西的开发,比江南稍早,但东汉后期由于和羌人的战争,这里又衰落下去了。至于东北地区,基本上是一片处女地。

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知识、技能逐步向四周推广,经济区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的关系极大,我国人工灌溉的历史虽然相当早,东汉以前,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却主要集中在关东、关中及巴蜀一带。东汉时期,在一些落后的地区也出现了较大的水利工程。在陇右河西地区,当马援驻防金城(今甘肃兰州市)时,“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①。任延出守武威(今甘肃武威市),“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②。在江淮地区,张禹出任下邳(今江苏徐州市)相,修复了蒲阳陂,灌溉面积由数百顷扩大到千余顷。陶谦为徐州牧时,又“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秔稻丰积”^③。在长江三角洲,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镜湖的修建。堤塘周围五百一十里,灌溉土地九千余顷,成了水旱保收的所在。但上述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开发,充其量只是点,而不是面。其真正的开发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出现了两次流徙狂潮。第一次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时候,第二次是十六国到北魏统一北方前夕。后一次流徙的规模又大于前一次。流徙的主要区域有三个:1. 长江流域;2. 陇右河西一带;3. 东北,尤其是辽东地区。据近人统计,永嘉之乱到刘宋时期由中原流入南方的人口大约为九十万左右,

① 《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

② 《后汉书》卷76《循吏·任延列传》。

③ 《三国志·魏书》卷7《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

相当于北方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强。需要说明：这仅是封建政府控制的侨户，地主阶级控制的依附农民没有计算在内。《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序》曰：“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是东晋南朝时期各地普遍的现象。成为客后，就不再向封建政府呈报户口，他们的总数恐怕不会低于上述数字。十六国初期，河西地区相对安宁的状况吸引着中原人民。《晋书·张轨传》曰：“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苻坚统一北方后，为经营西域，又迁江淮及中原地区一万七千余户于河西。淝水之战后，流入这里的也不少。和河西相比，流入辽东的人似乎更多。《通鉴》卷 60 曰：“公孙度威行海外，中国人士避乱者多归之。”《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述永嘉之乱后“百姓失业，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流入的人口高达“旧土十倍有余”。西晋平州共有一万八千余户，十倍有余，则达十八万户左右，以每户平均五口计算，为九十万左右，以致出现了“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①的局面。^②

过去，我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大规模的流徙使人口分布状况比以往合理了一些。他们的流入，改变了这些地区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的状况，也把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能传播到了这些地方。他们和当地人民在一起，开发了这些地方。其中，江南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加以较长期的相对安定，发展更迅速。《宋书》卷 54 沈约论曰：“江南之为国盛矣！……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殄灭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

① 《晋书》卷 109《慕容皝载记》。

② 本段参见李剑农著《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第 1 章第 1 节；王仲荦著《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 5 章第 2 节。

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到陈朝时，江南更是“良畴美柘，畦畝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①。一派锦绣江南的风貌已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就是交广地区，据《水经·温水注》曰，如果“米不外散”，则“恒为丰国”。《宋书·周朗传》曰：“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江南地区的家庭纺织业虽然还不如北方，粮食产量则已呈现超过的趋势了，它已经成为我国另一个经济重心。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无怪乎隋王朝统一后，就急于着手大运河的开凿。隋唐时期，这里是帝国重要的财赋来源之一。唐朝时，人们要问什么地方最富庶，回答是“扬一益二”^②。韩愈在《送陆歙州诗》序中曰：“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说明安史之乱后，这里已成了唐帝国经济命脉的所在。到宋朝时，我国的经济重心终于移到了南方。^③

河西和辽东地区后来卷入了战乱，因此它们的开发不如江南，但毕竟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我国历史上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就河西而论，随着经济的开发，文化也兴盛起来。《通鉴》卷 123 曰：“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这里的文化水平一度超过了中原。过去是中原影响四周，现在是河西影响中原。魏孝文帝改革时，许多典章制度的厘定，都有河西士人参加。中原地区经学的复兴，很大程度上仰仗于河西。直到唐代，河西文化的影响还不可忽视。唐代经济文化的昌盛，与吸收外国优秀文明密不可分。外国优秀文明传入我国，是经过几番消化过程的。第一步是西域，第二步就是河西。河西经济文化的高涨，对外来文化的汉化起着重大的作用。经过这里的消化再传入中原，就十分容易为中原接受了。

① 《陈书》卷 5《宣帝纪》。

② 《资治通鉴》卷 259。

③ 本段参见王仲荦著《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 6 章第 7 节。

辽东地区的开发意义甚为深远。以前,活跃在我国历史舞台上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西北地区的。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登上了历史舞台,越来越活跃,对我国历史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与辽东地区的开发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世家大族。这一阶层形成于东汉中后期,两晋及南北朝前期进入了鼎盛阶段。他们的特征是:1.占有大量土地;2.奴役大量依附农民及本宗族中贫困化了的成员;3.享有政治上及经济上的特权。地主阶级中另一阶层是寒门地主,一般来说,他们不享有特权,有些寒门地主占有的土地并不少于世家大族。南北朝后期,世家大族在各族人民的打击下,在统治集团内部争夺中,逐渐衰落下去了。庶姓寒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逐步上升。后起的关陇集团虽带有世家大族的一些特征,毕竟和以前的有些区别。

在世家大族形成的过程中,被他们奴役的农民的身份地位日益下降,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人身依附关系较为强烈的时代。这时,从事农业劳动的依附者一般被叫做部曲佃客。世家大族奴役部曲佃客的特权在三国时得到局部的承认,西晋时通过占田制而普遍化,但在数额上有一定的限制。这是两汉以来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结果,曹魏屯田、西晋占田、北魏均田并没有改变大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状况。

目前较为流行的看法是,这一时期地主占有土地后,经营方法往往采用庄园经济。庄园经济是否占主导地位?尚有待于深入研究和探讨。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除了人们所说的庄园中采用两汉以来的分成制(实物地租)剥削方式外,还存在着较多的租佃关系。《晋书·李特载记》曰:“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力,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又知特兄弟频请求停,皆感而待之。且水雨将降,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遂相与诣特。”《华阳国志·大同志》的记载大体相同,只是进一步说明分布在梁益二州的十多

万流民是“随谷庸赁”。唐长孺先生指出，这是一种租佃关系。^①为数十几万，决不可忽视。《晋书·张光传》亦有同样内容的记载。南北朝后期，租佃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通典·食货典》卷7曰：“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纲隳繁，奸伪尤兹。高颍睹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太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对此，杜佑特意加了一个注：“浮客，谓避公税依强豪作佃家也。昔，汉文三年除人田租，荀悦论曰：‘古者什一而税，天下之中正，汉家或百而税一，可谓至轻矣。而豪强占田逾侈，浮客输大半之赋，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惠不下通，威福分于豪人也。不正其本，适足以资富强矣！’”不难看出，在杜佑心目中，浮客就是佃客，受着分成制剥削，缴纳实物地租，和两汉租佃农民一样。杜佑是中唐人，他对浮客的看法，应是比较接近实际的。上述记叙源自《隋书》，不过在《隋书·食货志》中浮客被叫做“浮浪人”，他们在东晋时就存在，那么租佃关系，无论南方或北方，都有所发展。部曲和佃客又叫“属名”，所谓“属名”，指的是“皆注家籍”。只有附在主人的户籍之下，才得到封建政府的认可。没有附籍，就是浮客，封建政府有权把他们搜括出来。他们租种地主的土地，必然会与地主产生依附关系，但封建政府可以随时把他们搜括出来，表明这种依附关系并不稳定，身份地位应比“注家籍”的部曲佃客略高一点。他们应是唐王朝时客户的前身。隋王朝推行输籍法和大索貌阅时，搜括出的隐漏人口就达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余人。其中绝大部分应是浮客。可见隋王朝时租佃关系已有较大的发展。尽管在唐律中还能见到部曲身份地位的详细规定，但社会生活中有关部曲的记载极少，表明唐王朝承接了南北朝

^① 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第148页。

以来的趋势，租佃关系进一步发展起来了。

总之，隋唐时期经济区域扩大了，分布亦较前合理。这些新经济区域的开发，起自东汉，奠定于魏晋南北朝，收效于隋唐。南北朝后期，租佃关系日益发展，人身依附关系稍见削弱，对直接劳动者的劳动兴趣有刺激作用。因此，只要全国统一，社会安定，政治较为清明，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两汉的经济文化高潮的到来，乃是势所必然。

二

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据极其粗略的统计，在北方和汉族融合在一起的少数民族，仅乌桓、匈奴、羯、氐、羌、鲜卑，人数就远超二百万。这样规模的民族融合，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经济是基础，是纽带。历史上各民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飞速发展的现象屡见不鲜，但并不能促使他们融合在一起。只有各族人民交错杂居在一起时，经济的纽带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因此，民族融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 打破各民族较为固定的居住区域，各族人民交错杂居在一起。2. 落后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达到先进民族的水平，也即内迁各族由游牧或半游牧生活过渡到农业定居生活，社会制度则实行封建化。这两个条件的形成，开始于两汉，完成于魏晋南北朝。

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一代，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就开始了内迁。这种内迁，有强迫和自愿两种。乌桓归附较早，在汉武帝打败匈奴后，就居住在河北怀来到辽宁辽阳一带塞外。汉魏之际，中原战乱，乌桓内迁骚扰北方。曹操打败三郡乌桓后，逼迫他们进一步

内迁,人数为十余万左右。东汉初期,匈奴分裂,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归附,最后定居于今山西北部,并伸展到了山西中部。这一部分匈奴计三万一千余落。据马长寿先生的意见,西、北少数民族每落为五到七人,那么其人数在十五到二十二万之间。魏晋之际,塞外匈奴继续内迁,人数为二十八万左右。羯是匈奴别部,随匈奴内迁,冉闵搞民族仇杀时,一次杀了二十余万人。但其后我们还能看到羯人的活动,那么内迁羯人不会低于二十万。氐分布在甘肃、四川、陕西交界区,羌分布在甘肃、青海一带。东汉时,一部分被征服的羌人迁到了三辅一带。魏晋时,内迁氐羌更多。“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①主要是指氐羌而言,那么人数为五十万左右。事实上内迁氐羌决不止此数。就氐族来说,苻坚搞军事殖民时,一次分迁各镇的氐户为十五万,七十五万人左右,留居长安周围的还不计在内。鲜卑从2世纪起,就在东起辽东,西抵河西这一条漫长的边境线上分数路向中原突进。汉末,鲜卑就有控弦之士二十余万,算上妇女老幼,人数起码加倍。魏晋时不会低于此数。^②

汉族地主阶级允许或强迫少数民族内迁,在两汉是为了加强对各族的控制和巩固边防;在汉末魏晋,主要是为了扩大兵源和补充中原的劳动力。魏晋之际,少数民族的内迁,对中原经济的恢复是有贡献的。

各少数民族内迁以前,就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族的影响,内迁后变化更大。其中氐羌内迁较早,受影响较深,汉化程度较高。在汉魏之际氐已是“姓如中国之姓矣……多知中国语”^③了。

《三国志·魏书·牵招传》曰:“又表复乌桓五百余家租调”;《晋

① 《晋书》卷56《江统传》。

② 各族内迁区域参见王仲荦著《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3章第1节。

③ 《三国志·魏书》卷30《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书·王恂传》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那么魏晋之际乌桓、匈奴、羯已是过渡到农业定居生活上来了。内迁最晚、最落后的是鲜卑。但在汉族的影响下也学会了制作兵器，“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①。西晋时，居住在辽东的鲜卑慕容部更是“渐慕诸夏之风”，“法制同于上国”^②了。这类情况无疑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毕竟是极初步的。第一，各民族还有较为固定的居住区。第二，内迁各族的部落组织还保持着。鲜卑自不待言，匈奴则有五部组织，就是汉化程度较高的氏羌，酋长还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及号召力。苻洪“世为西戎酋长”^③。姚弋仲“世为羌酋”^④。历经十六国到北魏统一北方这一百二十多年，才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这是多灾多难、战马嘶鸣、刀光剑影、血流漂杵、尸骨满野的漫长的年代。肥沃的田野在马蹄下呻吟，繁华的城市和富饶的村庄在火光中化为废墟。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战乱中丧生；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去寻找较为安宁的环境；差不多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人成为战俘，在刀剑的逼迫下，在棍棒和皮鞭的抽打下，甚至是在镣铐或绳索的捆绑下，衣衫褴褛、步履蹒跚地被驱赶到新的地区；幸存者则要随时准备拿起刀剑，凭借村寨城堡的掩护，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在极为高昂的代价下实现了各族人民的交错杂居。在日后的年月中，各族人民生生不息，共同生活，进而并肩战斗，终于在南北朝后期，争来了民族融合的丰硕成果。

鉴于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社会制度先进，很自然地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核心。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族融

① 《三国志·魏书》卷 30《乌桓鲜卑东夷列传》。

② 《晋书》卷 108《慕容廆载记》。

③ 《晋书》卷 112《苻洪载记》。

④ 《晋书》卷 116《姚弋仲载记》。

合又叫做“汉化”。汉化比封建化的含义更广,它不仅包括经济生活及社会制度,还包括心理素质及语言等。尽管民族融合的核心是汉族,内迁少数民族全都采用了汉族的语言,但决不能认为只是汉族“化”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对汉族没有影响。即便以语言而论,《颜氏家训·音辞篇》曰:“南染吴、越,北杂夷、虏”,说明汉族的语言也受到少数民族的巨大影响。

“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它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一民族在世界文化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①民族融合给汉族注进了新的血液,使之向前大大发展了一步,更有生气,更富创造力了。

内迁少数民族是聪明智慧的,他们接触到了先进的文化技术后,便会在此基础上从事前所未有的发明创造。鲜卑人叱干阿利,造出了“百炼刚刀”^②。匈奴人綦毋怀文“又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③。宿铁刀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的锻钢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少数民族在牲畜饲养、兽医及畜产品的加工方面都有相当高的水平,有的远远超过了汉族。

内迁少数民族是富有生气的,充满生命力的,平心而论,有些政权的统治要比汉族地主阶级好得多。后赵石勒统治时,赋役轻于两晋。前燕慕容廆、慕容皝父子统治时,流民安居乐业,辽东地区得到了迅速的开发。前秦苻坚统治时,“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④。“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⑤后秦经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第381页。

②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4《夏录一》。

③ 《北齐书》卷49《綦毋怀文传》。

④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⑤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姚兴的治理后,连沈约也不得不说:“是时关中丰全,仓库殷积。”^①尤其是处于野蛮状态的鲜卑拓跋部,它统一了北方,统治的时间也最长,给中原注入的新东西就更多。

拓跋部进入中原之初,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的初期,妇女的地位比较高,可以公开地参与社会活动,即使部落贵族,也实行着一夫一妻制。这一特征被他们带进了中原。《颜氏家训·治家篇》曰:“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窶,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唱和之礼,或‘尔汝’之。”夫唱妇随,这是封建文人鼓吹的美满婚姻,北方要比南方普遍得多。这种夫妻之间较为平等的“尔汝”关系,是和一夫一妻制密不可分。元孝友在奏议中曰:“古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晋令》: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阴教聿修,继嗣有广。广继嗣,孝也;修阴教,礼也。而圣朝忽弃此数,由来渐久,将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妇人不幸,生逢今世,举朝既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设令人强志广娶,则家道离索;身自违遭,内外亲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无准节。父母嫁女,则教以妒,姑姐逢迎,必相劝以忌。以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犹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②一夫多妻,广置妓妾受到社会的谴责,为风尚所不容(帝、王除外,但综观北朝,亦比南朝好),在此一目了然。在元孝友看来,这是妇人之不

① 《宋书》卷45《王镇恶传》。

② 《北齐书》卷28《元孝友传》。

幸,妒忌之风太盛。实质是妇人之大幸。较之魏晋南朝帝王后宫动辄数千直至上万,豪富之家妓妾盈房,甚至超过八百之数,玩弄婢妾这种糜烂的状况,无疑是一次社会变革。就这一点而论,北朝的社会空气要比南朝健康清新得多。

由于拓跋部处在奴隶制的初级阶段,对战俘及掳掠人口的处置也要和缓一些。确实有大量的人口沦为奴隶,但更多的是当做隶户、新民和屯田户来安置的。其中新民的待遇与一般拓跋族成员差别不甚大,而对新民的“计口授田”则成为后来推行均田制度的渊源之一。长期以来,在地主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如何维护编户齐民的生产,确保封建政府的赋役收入,如何较为合理地使用国有土地,一直没有较好地解决,均田制无疑是当时情况下较为妥善的措置,因此它一直延续到了隋唐。至于隋唐时期武功显赫的府兵,则是北周时期借用拓跋部落兵制的躯壳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这是人所共知的情况,在此就不再赘述。

内迁各族和汉族的融合,还大大地丰富了汉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物质生活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食品、服装及家具等均有明显的变化。《宋书·五行志》曰:“晋武帝泰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貂盘,及为羌煮、貂炙。贵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会,皆此为先。太康中,天下又以毡为钅头及络带、衿口……毡产于胡。”其中胡饼、胡床、胡服对汉族的影响尤大。汉族过去的面食中有“汤饼”,但这不是真正的饼。不过是水煮的面食,今天江南某些农村还保持着这种习俗。真正的饼是焙制的,因为由少数民族传来,所以才叫胡饼。其后在胡饼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品种日益多样化,成为面食制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方法,可以说是面食制作的一次革命。汉服宽袖长袍,右衽,胡服夹领小袖,左衽,紧身小袄较为流行。魏孝文帝改革时曾下令禁胡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官场上虽是峨冠博带,《梦溪笔谈》中说日常生活却“全用胡服”,后来官场上